

正确看待战时共产主义

——读列宁的《论粮食税》

柳 振 铎

怎样看待战时共产主义？一种意见给予全盘否定。他们引证了列宁的部分论述，只提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和“失败”，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①，也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概念，第一次见诸列宁的《论粮食税》。在这篇著作和其它著作中，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虽没有完全肯定，但也不是全盘否定。就笔者读书所得，列宁的观点是，战时共产主义作为战争时期的特殊政策是必要的，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则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来说，是一个崭

新的课题。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确有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1917年8—9月，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②1921年10月29—31日，他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中，非常坦率地承认在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曾经“认为可以不经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③列宁当时希望，在十月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3—21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中指出：“现在，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其开支。”^①

我们正处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隆重纪念伟大导师列宁逝世六十周年的时刻，学习他的光辉著作《论合作制》，倍加亲切，尤感重要，更受教益。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两个重大发展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这一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和重大意义，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的求实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2页

：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列宁著作引文，均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

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的情况下，通过比较短的道路，即用国家法令，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反映在实践之中，以余粮收集制和国家垄断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有所体现。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业上，实行大、中、小企业全部国有化，工业管理实行统计和监督；商业上，国内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制，禁止一切私商活动；农业上，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的谷物量、畜牧饲料量以及种子量，多余部分全部上交国家；分配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通过消费合作社对全体居民进行必需消费品的分配。此外，还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不劳动者不得食”，强迫地主资产阶级参加劳动。

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它不仅需要很长时期、经过许多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完成，而且还需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然的话，“欲速则不达”，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经过两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道路。余粮收集制收集了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是必需的粮食，损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农民愿意接受余粮收集制；一旦战争宣告结束，条件起了变化，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就日益表示不满了。让其继续下去，必然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工农联盟，从而破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列宁很快地觉察到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所在，他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

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①在苏维埃政权这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单靠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国家的行政命令，试图一举建成社会主义，正是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错误”、是“失败”^②、是“蠢事”^③。

在战时共产主义问题上，列宁的论断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他在检查曾经有过错误的指导思想时，一再说明这一政策首先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对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④

苏维埃政权的屹立，使国际帝国主义异常恐惧。它们害怕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会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仿效的榜样，危及他们的统治；同时，他们也不甘心失去借给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几十亿卢布、从俄国取得的巨额利润以及它们所拥有的煤井、工厂、矿场等等。从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起，它们就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妄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由此目的，各协约国政府决定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参加这次武装干涉的共有十四个国家，除英、美、法、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6—517页

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外，还有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与此同时，俄国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党派，企图卷土重来，策划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叛乱。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共同目的下，由帝国主义指使，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纠合一起，向社会主义的俄国猛扑过来。

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十分疯狂。从1918年夏到年底，英、法、日、美、意帝国主义采取不宣而战的手段，把军队开进俄国，并在俄国许多边疆地区颠覆了苏维埃政权，扶植了傀儡政权。英、法帝国主义还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制造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德帝国主义也趁机破坏，在顿河一带暗地支持白卫将军克拉斯诺夫的叛乱。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英、法、日、美、意帝国主义支持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制造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协约国进军”。第一次叛乱开始于1919年春，从东面进军的高尔察克是这次叛乱的主力，在南面有邓尼金的军队，在北面有英、美、法的混合部队和白卫将军米列尔的军队。第二次叛乱开始于1919年夏，参加这次进军的有邓尼金、尤登里奇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充当急先锋的是邓尼金。第三次叛乱开始于1920年4月，这次进军是由波兰地主武装和弗兰克尔在西线进行的。这就是说，从1918年上半年开始，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土上，北方、南方、西方和东方，到处是敌人燃烧起来的战火。“炮火包围着我们！凶狠的野兽齐向我们猛扑。祖国的土地上盘踞着暴徒。”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诗篇，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接过来的本是一个衰微破败的经济。早在1917年夏，食物和燃料就已非常短缺。同年秋，生产水平只有1913年的

30%—40%。1918年上半年战争开始后，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苏维埃政权，四分之三的领土很快归于沦陷。一些最主要的粮食产地（乌克兰、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和原料、燃料产地（顿巴斯的煤、克里沃罗格的铁矿、巴库的石油、土尔斯坦的棉花）都被敌人所切断。由于粮食、原料、燃料的严重不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忍饥挨饿，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而且不是经常如此。许多工厂停产，1918年夏末，大约有40%的工厂企业没有开工。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宣布全国为军营，把全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转入战时的轨道。战时共产主义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动员了一切国内资源，对保证战争胜利、挽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有人统计，1919—1920年间，通过余粮收集制，一共收购粮食和饲料谷物2125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马铃薯3500万普特，干草260万普特，牛油128万普特，鲜奶1014000普特，**酸奶油28000普特，家禽178000普特，蛋22700万枚。**这是一些不算小的数字。1927年，苏联富农交出的商品粮只不过13000万普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出的商品粮更只有3500万普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解决，保证了红军和城市居民的起码需要，造成了一个努力支援前线的可靠后方，有力地粉碎了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列宁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原因就在这里。不妨来个假设，如果当时不实行这样非常措施，很难想象出战争将是什么结局。

当然，列宁并没有夸大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他说，“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①这里，列宁把战时共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6—517页

产主义的功劳限制在战争方面。假如向前跨进一步,说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好办法,那就非常荒谬的了。

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查我们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侵略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个结合问题,那时我们还顾不到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①

1920年底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地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从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上面。这一工作重点的转移,着手于1921年初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和采取新经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粮食税,农民生产的粮食,只有一部分作为公粮上交国家,数量低于过去余粮收集制;允许贸易自由,小商小贩可以进行合法经营,私商可以在合法范围内直接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出售工业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是租让制和租借制,前者是按照一定的条件,把某些工矿企业、森林、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后者是按照一定的条件,把某些国有企业或林地租给本国资本家经营。

新经济政策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它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可是,这样一个正确的经济政策,在苏维埃政权抗击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进攻的紧要关头,既没有想到,也不可能付诸实践。以粮食为例,当时粮食非常紧张,粮食投机活动也非常猖獗。富农极端仇

视苏维埃政权。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粮食,根本拒绝国家收购。他们抬高粮价,大搞投机活动。他们有时以低价卖给贫苦农民,那是为了收买,挑唆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许多农民趁机捞一把,也不愿把粮食卖给国家。在基辅,粮价涨到200卢布一普特,比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6卢布一普特高出三十多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利用粮食困难,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反革命煽动,叫嚷废除粮食垄断,实行粮食自由买卖。这个时候,获得粮食就意味着赢得战争、挽救革命。怎么办?苏维埃政权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直到实行余粮收集制。否则,实行粮食税,允许贸易自由,象后来的新经济政策那样,那将是投敌人之所好,助长粮食投机活动的泛滥。

其实,战时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下子采取的。1918年5月,苏维埃政权对粮食实行专卖;1918年10月,过渡到向农民征收农产品实物税。由于富农和奸商的破坏,法令难以施行。为了供给红军粮食,并把工人阶级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苏维埃政权于1919年1月通过了“关于在各产粮省份收集余粮和饲料交给国家支配”的法令,即余粮收集制。历史事实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固然有着主观设想,但首先是形势所迫,也可以说是敌人逼出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如前述。但在当时战争期间,农民还是拥护这一政策的。因为他们从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土地,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支援战争,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研究一个历史事件,首先要考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全部内容,绝不能非历史地或者孤立地分析问题。对于战时共产主义,亦须作如是观。农民不满战时共产主义的情绪是有的,那是在战争结束,战争威胁已成过去的时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6—617页